

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民主政治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a's Political Democracy

张志明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

张志明 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张志明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085-1191-7

I. 中… II. 张… III.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0483号

著 即志明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

编 著 张志明

责任编辑 魏秀堂 饶凤岐

装帧设计 曲晓华 韩 宇

电脑制作 平面|工作室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
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 100038)

电 话 86-10-58891281(发行部)

承 印 北京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3.625

字 数 50千字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引 言	1
壹 中国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	3
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3
中共要走出一条民主新路	10
中共在革命时期的民主成就	15
贰 走进人民民主时代	25
一党独裁的失败与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25
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人民民主制度的奠基	29
把人民民主原则贯彻在整个宪法中	33
叁 人民民主的挫折与希望	42
人民民主与人民内部矛盾	42
“大民主”的误区及其反思	46
党内民主开辟改革开放新时代	49
肆 人民民主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53
以改革推进民主发展和法制建设	53

市场经济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	58
依法治国为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	6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民主政治	61
科学发展观与人民民主的新方向	63
 伍 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成就	 72
人民民主制度不断完善	72
基层民主建设成效显著	79
开辟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新篇章	83
民主执政成为中共执政的基本理念	91
建设人民的政府民主的政府	96
司法民主的新发展	101
 结语：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展望	 108

引言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谈到，“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不但没有产生政治混乱，而且还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并愈演愈烈的混战时代。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有代表性的较为公允的评价——尽管当时他们还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共及其政府“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80多年的历史，不仅是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富强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为人民民主孜孜探求和奋斗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都曾笃信只有师从西方民主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拯救和复兴民族的先驱。

然而，一次次的沉痛失败警示他们，无论是西方君主立宪政体

还是共和民主制度，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促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万能良药。在苦苦探索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历史关头，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希望和前途。

他们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是要放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恰恰是要探索一条全新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之路。他们在继承近代中华优秀儿女对中国式民主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民主的全新道路，并从此成为中国民主的旗帜，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无私无畏的捍卫者、探索者和实践者。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探索能给人民以真正福祉的民主新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主体地位，而如此无私无畏和慷慨悲壮地奋斗过、牺牲过。

鉴往可以知来。80多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必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给中国人民以真正福祉的中国民主事业的奋斗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

1922年，中共在其创办的《向导》发刊词中指出：宪政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作为“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回国考察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之后忧心如焚。但延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之行，他却深深地为共产党人开创的民主新风和“延安精神”所打动，预言“假如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思考和接受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是以拯救民族和复兴民族这两大主题为基线的。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也同此理。而促使他们最终放弃民主主义而师从苏俄劳动阶级民主的直接动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则是“五四”反帝爱国民主运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19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深深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另一方面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

前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参照，迫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奋起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就是向西方学习。

但是，从“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再到共和民主的辛亥革命，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¹后来成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感慨地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清帝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²

就在中国政治民主道路处于十字路口的严峻关头，中华民族的一批最优秀分子开始了对中国宪政民主道路的全新思考和探索。他们就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苦苦求索中的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民主制度产生了深深的疑惑。正当这种怀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升级而日益增强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国内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民主运动。也正是“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全民族的觉醒，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潮在中国的迅速高涨。

“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探索彻底改造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新的道路。这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大多数原是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所以他们都面临一个如何看待民主的问题。而他们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首先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产生怀疑开始的。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民主派政治家们就开始了向西

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性反思。如梁启超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只能是少数人的精英政治，“主权在民”不过是一种“极端之民权主义”的“空想”；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认为这种民主只是“智识阶级”的政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专制”。那么，如何既避免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又能够真正实现政治民主的理想呢？这种在批判西方议会民主弊端时出现的难题，终于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初步得到了解决。

最先论述无产阶级民主的是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封建王朝的谭平山。他认为“一定要人人在政治上产业上社会上，都同是有个平等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才能。既不许哪一种阶级拥有特权，来压制自己，也不希望自己拥有特权，去压制他人。”³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自由。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则认为，“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它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⁴。显然，谭平山所说的“现代民治主义”和李大钊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0页。

2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3 《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7页。

4 《李大钊文集》下，第607-609页。

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是和他们曾经极力追求的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得多的民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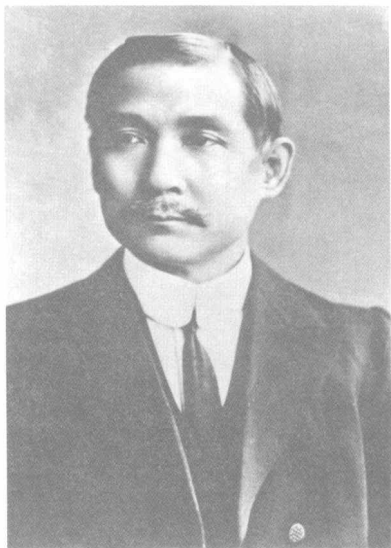
不过，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如何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现实问题。当1920年陈独秀（中共创始人之一）开始“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之后，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注意力倾注到了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探索方面，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⁵。毛泽东在“五四”以后也曾热衷于宣传不流血的革命，并且一直致力于家乡湖南省的自治运动。但这年冬天他却完全接受了俄国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在叙述自己的认识变化时说，那种“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企图用和平改良的方法以免“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看法，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中国之必须进行“俄国式的革命”，也是现实逼出来的⁶。

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它与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究竟是什么关系？最终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解决这一艰巨问题的正是毛泽东。

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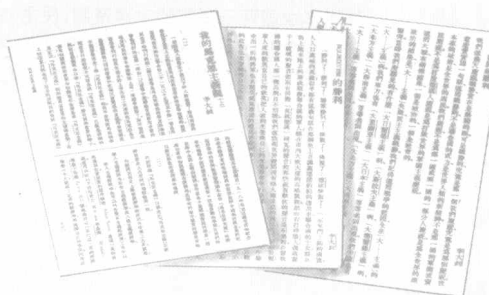
⁶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开始播向人心。图为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殖民者用炮舰加鸦片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国一度成为他们掠夺和瓜分的对象。图为 1842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时的情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诞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图为李大钊和他在1918年、1919年发表的3篇文章。

1919年北京爆发了以北京大学学生为先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促进了民主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工人阶级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导作用。图为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的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



中共要走出一条民主新路

1945年7月，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应毛泽东之邀访问了延安。在访问结束时，黄炎培感慨万端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日久天长，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罢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⁷

毛泽东的回答，既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到的中国式民主新路的集中概括和精确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基本经验的归纳和总结。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人民民主之路，就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当家做主人的民主之路。它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逐渐实现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人的目标。

⁷ 黄炎培：《延安归来》，第36页。

民主新路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在中国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之于对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道路的探索 and 选择；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也必须首先回答什么道路才是解救中华民族的切实可行的道路。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系统科学的解救近代中国苦难命运的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正确地回答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和内容、地位和作用、方式和途径以及发展方向等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中国民主实践。这种系统科学的中国革命理论就是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这一科学理论，令人折服地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关于中国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最关键性的问题，如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进程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的关系问题；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等。

毛泽东从一种全新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其基本结论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国家形态，“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

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⁸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新模式：

第一，一个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以及如何才能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治，最终只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取决于由这种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社会革命的性质。这是谈论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前提。只有首先明确了这一点，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民主政治的阶级构成、政体形式、地位作用以及实现途径。

第二，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状态下，既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实现劳动人民的民主政治。因此，必须把争取民主政治的奋斗同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奋斗结合起来。

第三，在面临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任何单一阶级的民主政治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必须让位于由各抗日阶级、阶层共同参与的民主政治。为此，必须“将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⁹“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种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¹⁰

第四，要实现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民主政治，必须有